

【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

DOI:10.15986/j.1008-7192.2021.04.001

论安德瑞·高兹“经济理性”批判思想及其生态意蕴

程丽琴¹, 孙迎联²

(1. 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 马列教研室, 浙江 湖州 313004; 2. 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摘要: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左翼理论家,安德瑞·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肇因于“经济理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但生态危机的解除并非要全盘否定“经济理性”,而是要重新审视“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二者之关联,合理地限定经济理性,使之服从于生态理性。在此基础上,高兹对如何超越“经济理性”的藩篱进行了系统阐释,并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的论断。这些思想与观点既丰富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环境理论,也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借鉴。

关键词:安德瑞·高兹;经济理性;生态危机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21)04-0001-07

20世纪60—7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恶化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问题。在此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从生态学角度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安德瑞·高兹(以下简称高兹)主张通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奉行“经济理性”的逻辑必然,提出构建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解放之路。

国内学者对高兹思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学界对高兹思想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徐崇温^{[1]397}从哲学的角度分析,认为高兹通过存在主义追求抽象的个人自由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是一种“当代的存在主义”。李宜青^{[2]101}认为,高兹的“政治生态学”理论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独树一帜,但其“使社会主义从科学退回到乌托邦的做法,必然使他对未来产生悲观主义,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第二个阶段是本世纪初至今。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逐步推进到深化阶段。陈学明^{[3]151-153}高度肯定了高兹的生态学思想,并指出其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最尖锐、最系统的。汤建

龙^[4]对高兹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提出高兹以批判现代性为主的经济理性批判思想,对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同样具有借鉴意义。解保军^[5]认为,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思想为中国反思现代化提供了借鉴,但其思想是在特定的西方现代化背景下提出的,是对经济理性过度膨胀的纠偏,必须辩证地看待这一思想。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6]。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思想有其独特的理论意涵,将其置诸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宏观场域,深挖其理论中适用于中国的合理成分,有利于丰富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理论,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向更加高水平发展。

一、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哲学反思

20世纪中叶以来的生态环境恶化,引发了民众以反对环境公害为主题的生态斗争,部分后现代主义学者们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现代化,并主张

收稿日期:2020-10-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的中国生态政治学逻辑建构研究”(16BKS062);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项目“智媒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KYCX20_0075)

作者简介:程丽琴(1990-),女,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马列教研室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孙迎联(1967-),女,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E-mail:1590517503@163.com

要退回到非现代化的状态^{[7]164}。对于这样的观点,高兹指出,导致生态危机的症结并不在于现代化本身,而是隐藏其后的追求经济理性的非理性动机。换言之,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驱逐现代化,而是要使现代化趋于合理和发展。

上述结论是建立在高兹对“经济理性”的历史溯源基础上的。恩格斯曾指出,人类历史活动的第一个因素是生产满足物质生活条件需要的资料,第二个因素就是为了满足新需要的产生,“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8]79}。以唯物史观为出发点,高兹进一步解释道: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时代,囿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和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奉行的“知足”“足够”的存在意义上的原则,自然的被索取与其恢复程度基本保持同步。当人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其需要和工作强度时,经济理性并不适用^{[9]111}。17世纪后,重大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接踵而至,不断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以笛卡尔等为代表的唯理主义思维方式形成并流行起来,市场的经济理性符号不断激化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们日益扩大的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经济理性发端于计算和核算……从我的生产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市场那一刻起,经济理性就开始启动了”^{[9]109}。通过技术征服自然、通过摄取自然资源以获得更大利益的理念有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存在意义上的“知足”被“更多”“更好”的客观标准所替代,最终“经济理性”的观念导致人们失去了对自然的尊敬,并借助技术手段满足生产效率、消费和需求最大化,从而导致了生态危机的爆发。简言之,“经济理性”奉行的是金钱和利益至上原则,是建立在利润尺度上的用以衡量人与事物价值的一种市场经济理性符号。

高兹在对“经济理性”观念进行历史追溯和定义的同时,揭示了经济理性所带来的环境危害和社会危害。

首先,“经济理性”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欲与控制欲。马克思认为资本理性与生态理性具有对立性,“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维持人类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8]697},并据此分析了资本理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指出在资本理性的

驱使下,断送了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命根基。“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地球的躯体、内脏、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8]875}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学者威廉·莱斯认为,由于“控制自然”的观念,人们盲目地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生产生活,造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的生态危机。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从认识论角度去探索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深层逻辑上的延续。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方式的逻辑必然^[5]。在阐述“经济理性”带来的灾难性恶果时,高兹引用了哈丁的“公地悲剧”假说,即每个农民为追求自己利润的最大化,将无视资源的有限性去不断扩大自己的牛群数量,这样的后果就是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枯竭,损害了他人合法利益,也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在高兹的理论视域中,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是截然对立的,而这种对立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奉行经济理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背后是自然资源与能源最大限度的消耗,从而加剧了自然生态上的危机。与此同时,人们对生态的需求,例如“我们对空地、新鲜的空气、水等在市场上买不到的需求”被完全排除,这是“经济理性”所带来的生态危机最致命的悲剧。

其次,“经济理性”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解剖的出发点是“经济事实”,即劳动异化现象。其中马克思在对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的论述中指出,劳动本身的异化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了仅为维持生存的手段,人变成了丧失自己类本质的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提出了“自然异化”的概念,并明确指出:“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藐视和实际的贬低。”在此基础上,高兹将“经济理性”所带来的异化现象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金钱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为工具关系两方面。一方面,高兹在对“经济理性”带来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论述与哈贝马斯“认识—工具理性”思想产生了理论共鸣。他认为,理性本是服务于人的手段,却在“经济理性”的控制下,导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异化为纯粹的利益关系。在工具性、核算化的

生活中,对生活艺术、社会交往视而不见,对金钱和财富趋之若鹜,却对生活的真正需求缺乏真正的理性思考。因此,“由主观理性实行的对世界的控制预设了一个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人的理性已经是它自家的主人,即在人性的领域中它已是主人”^[10]。手段替代了目的原有的地位,使人们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俘虏”,进而产生和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为工具性的关系,金钱至上的“经济理性”遮蔽了人们对“空气、清洁的水、光线”等真正的需求,而是用成本-利益分析的方式来度量自然的价值。但成本-利益方式度量自然价值的背后,其控制的真正对象不是自然,是人的行为。正如黑格尔所说,控制的对象必须具有服从他人意志的服从意识,只有人才能是被控制的对象。

最后,“经济理性”的观念产生了“新奴隶主义”。高兹认为,随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从现象上改变了人们过去高负荷、长时间的劳动状态,但留有闲暇时间的人们在“经济理性”观念的作用下,仍然希望利用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处于社会技术和信息劣势的人群自愿出让自己的闲暇时间,而处于优势的精英则能够顺利地买到廉价的劳动力。因此,一种在实质上与以往的“雇佣奴隶”没有本质差别的“新奴隶主义”就产生了。“新奴隶主义”造成了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且使人们将闲暇时间的出让看作是理所当然,无法意识到人际关系中控制的存在。此外,“新奴隶主义”现象涉及的是社会分层问题,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有着根本上的联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就社会内部分工而言,形成了精英阶层和一个失业半失业的“非工人的非阶级”。与过去泰罗制机械性和碎片化的工作组织不同,现在的工人之间有了一定的合作,在形式上构成了稳定的合作团队。此时的工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具有阶级斗争意识的存在,更多的是拥有对工作具有认同感的稳定职业劳动者。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性质并未改变,形式上的合作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

高兹在对“经济理性”的观念所带来危害的分析中,不仅揭示了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

必然结果,而且通过分析异化现象,揭示了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之间的矛盾对立,在理论上昭示了生态文明必将替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历史趋势。

二、生态理性:破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性的禁锢

经济理性的本质是工具理性,其价值诉求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以积累财富,而生态理性奉行的是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二者在本质上存在对抗性。在高兹看来,要从根本上解放经济或商品理性,不是要彻底抹去“经济理性”的观念,而是要赋予其新的内涵,并树立生态理性,使经济理性为生态理性服务。

在个人层面上,要使劳动权利回归其本来面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劳动成为一种为获得劳动报酬的机械反应。在这样一种外在于人的强制性活动中,人们无法在劳动中感到幸福,而是感到压抑和不幸。高兹结合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状况,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进行了发展,并指出,“人们存在一种普遍的混淆,就是把劳动与工作或就业混为一谈,把劳动的权利与得到收入的权利混为一谈”^{[9]221}。要摆脱经济理性的束缚,一方面,要使劳动本身成为人的自主性行为。在长期奉行“经济理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将劳动等同于获得收入的权利,并将劳动看作是生存的唯一途径,这样就使得人无形中被禁锢在了金钱之中。因此,要让劳动者树立劳动的自主意识,充分发挥其能动性,将劳动看作一种目的性的行为,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另一方面,劳动权利的回归,需要具备充足的劳动岗位。“劳动的解放和劳动得少些从而每个人都能从事劳动的理念,说到底还是劳动斗争运动的发源地。”^{[9]221}劳动性质和生产工具的变化改变了劳动者的态度和意识,闲暇时间的增加和劳动岗位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者作为劳动主体的尊严的实现。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新的技术工作世界强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否定地位:工人阶级似乎不再与既定的社会相矛盾。这一趋势同时又在管理和指导方面为生产技

术组织的作用所加强。统治转化为管理。”^[11]因此,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是要在人均劳动时间减少的情况下,保证人们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劳动岗位,从而保障自己的劳动权利。

在社会层面上,要使经济社会向文化社会转变。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闲暇时间,自主支配的行为在社会活动中占据主要地位,人们从生活所累和金钱所困的处境中解放出来成为潜在的可能。马克思指出,艺术生产主要是通过其产品来满足人们情感和精神上的需要,其产品的价值主要在于其审美价值^[12]。“像技术一样,艺术创造了既同现存思想和实践领域相抵触,又在其范围内的另一思想和实践领域。”如同马尔库塞所指出的,艺术领域在社会的不合理性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文化上的改造能够从现存的技术合理性中找到否定的社会力量,发现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解放力量,从而逃离“肯定性”思维。威廉·莱斯认为,缝纫、学习、运动等每一种这样的能力,都可以满足一种需要,而这些活动却很少依附于商品,“交往的社会”将促使每个人尽可能多地参与社会交往实践,从而避免过分沉溺于金钱、商品、消费所营造的虚假的需要。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再到威廉·莱斯,都秉持着这样一种观点:人的满足最终源于自己从事的实践和创造活动。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兹,同样强调了文化交往活动对于社会发展的不可替代性。“艺术创作、读书写作、观光旅游、科学研究”等真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文化活动,能够使人们在闲暇的时间中充分感受自由和自主。当人们认识到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能以金钱进行价值量化,认识到那些不能用金钱购买到的东西恰恰是必不可少且弥足珍贵的,那么经济理性的思想根基也就动摇了^{[9][116]}。因此,高兹主张,要使社会赋予文化以更大的重要性,把“经济理性”从人们的闲暇时间中清理出去。

在国家层面上,要使生态理性成为社会的导向。生态理性的本质要求在于建立一个“人们在其中生活得更好而劳动和消费得更少的社会”,这一观点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位学者本·阿格尔的“生态意识”在基调上是保持一致的。本·阿格尔认为:“生态意识”要求在社会的导向中增添生态学的内容,用生态思维去看待经济发展和评判经

济行为。“特定形式的分散化,非官僚化的社会主义将是培育新的生态意识的理想温床,这种生态意识既可以解决生态需要又可以反对我们称为异化消费的现象。”^[13]在这里,“生态意识”被赋予了特定的社会功能。据此,高兹提出,所谓“生态理性”,就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平衡相当,其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保证人们在非异化的劳动中感到劳动者的主体性与尊严,从而达到生态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内在统一。为进一步阐释“生态理性”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高兹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另一认识倾向即消费主义。由于经济理性的影响,人们在消费领域中存在这样的观念:要想完成某种预期效果,金钱是最佳的途径;自己付出劳动生产、提供的商品与服务不及付酬的市场上的专业劳动。因此,人们对于金钱的需要会随着消费的需求和商品的增加不断扩大,异化的观念就产生了,即获得金钱代替劳动本身的目的成为了工作的唯一目的。并且在社会各阶层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背景下,人们不断地沉湎于消费的狂喜中,消解了人们对于社会制度存在问题的思考。而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企业加快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以更多、更新的商品刺激人们消费,从而造成经济领域的浪费日益严重。正如美国销售分析家勒博所说:“我们庞大而多产的经济要求我们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浪费东西。”^[14]因此,从思想认识的高度去看待生态环境问题,“当人们发现消费越多并非必然导向更好的生活,他们也就逃脱了经济理性的禁锢”^{[7][116]}。

三、生态意蕴: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理性的现实进路

高兹对破除“经济理性”禁锢的理论构建,进一步完善了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同时,提出了生态危机出路在于树立“生态理性”,彰显生态意识对生态保护的意义。他对经济社会转向文化社会的论述,体现了文化建设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他对消费异化倾向的批判,凸显了其对现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否定,突出了制度对于生态保护的价值。

生态文明是构建在人们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基础上的,它以“生态化”的方式超越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要求人类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由此可见,生态文明对人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使“经济理性”服从“生态理性”,增强公民的生态意识,培养公民的绿色生活方式。在本·阿格尔“社会主义是培育新的生态意识的理想温床”观点的基础上,高兹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重塑”的观点,主张社会主义应当被看成是对经济理性的超越,健全的生态理性反对人们无节制地追求消费,反对把消费与幸福等同起来的错误观念。为了达到生态社会主义,他进一步提出,要从思想意识层面上来一场“文化革命”,要使人们从教育中、交往中和创造性的劳动中获得幸福感。

无论是本·阿格尔、威廉·莱斯还是高兹,抑或是后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突出代表人物福斯特,都从精神层面上分析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不仅观念与意识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独特的价值,伦理道德、社会文化的进步更是现实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例如,本·阿格尔认为,生态环境恶化的社会要以改变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改变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来进行一场全面的社会变革;威廉·莱斯认为,要降低生态风险,就要使人们树立尊重自然的伦理原则,依靠伦理道德的进步来控制人类的非理性欲望;福斯特认为人类对环境的不道德的观念与行为,必须通过开展一场将生态价值和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来解决;高兹则提出,“经济理性”打着“生态现代化”的幌子,将环境保护纳入生态商业以获取利润,实际上仍然是金钱和利益的逻辑。要将“经济理性”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剔除出去,就必须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多地倾向于不可量化的文化领域。“更加轻松和快乐的生活样式既可以减少人们的消费需要,也可以增加更多的消闲时间。消费得更少,更有特点,我们就会生活和工作得更好”^[15]。

高兹在对“消费异化”进行批判的同时,从制度上论证了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正如福斯特曾经指出的:“个体确实有必要加倍努力以更简单、符合生态要求的消费方式来安排他们的生活。但如果过多地强调这一点,那就是对个体赋予了太多的责任感,却忽视了体制性的因素”,要实现生态

正义,就要从制度上保障生态整体利益。首先,高兹指出资本主义逻辑奉行的是最大化的原则,即生产的目的是获得最高利润,靠的是最大限度地消耗能源和自然资源,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是不可能的;其次,高兹站在生态角度,通过苏联时期以生态环境为代价来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事例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能以忽视生态环境为代价,从而提出“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的思想。

四、现实意义:经济理性批判思想的中国启示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人民福祉与民族未来,高兹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观念的批判,蕴含着重要的生态意义,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启迪。

建设生态文明,要从思想根源上树立生态意识。首先,要在劳动实践中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要组织全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少年通过参加植树活动,亲近自然,了解自然,保护自然,培养热爱自然、珍爱生命的生态意识,学习体验绿色发展理念^[16]。在感悟自然、亲近自然的过程中,还要提升公民平衡人类需求和环境可持续的价值判断和考量,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辩证思维,培养公民尊重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其次,要树立绿色消费理念。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倡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多次强调要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近年来,西方消费主义理念在国内滋生,奢侈的消费风潮不仅带来了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社会思潮的暗流涌动,也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树立绿色消费理念就是让消费回归其本来面目,根据自身真实所需理性消费、合理消费,努力使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建设生态文明,要将生态价值和文化建设融为一体,生态文化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文化不可缺位,要加大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大众文化建设,营造生态文明建设的浓厚氛围。因此,在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中,一方面,可以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化,将生态理念借助多元丰富的文化形式传播出去,让生态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可以借助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介、互联网、新媒体等新媒介的传播方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典故、动漫、短视频等方式让其深入了解传统生态文化。另一方面,可依托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举办相关的节日活动^[17],让公民在健康、有时代感的生态文化活动中深化对生态文明的认知。例如,可通过展览馆、生态旅游等方式让人民群众切身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去。

建设生态文明,要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回顾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的那段历程,由于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等因素,导致了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鉴于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坚持将生态理性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结合起来。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2020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强调,“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8]。从制度标准制定上,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地理环境复杂,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因而环境制度的建构需要各地立足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依据自身的环境质量状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标准;在制度体系建构上,要健全并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环境污染追责制度等,依据环境问题的不断变化制定相应的配套制度,让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发挥系统性功效;在制度执行能力上,要将主体责任制严格落实到位,不断完善生态环境监管制度,对于污染严重的工艺、设备以及企业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度。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进程中,我们应努力从制度上保障生态文明建设,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用“美丽中国”印证高兹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

参 考 文 献

- [1] 徐崇温.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2] 李青宜. 当代法国的“新马克思主义”[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 [3] 陈学明. 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代表人物高兹[M]//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3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 [4] 汤建龙. 安德瑞·高兹哲学思想研究评述[J]. 哲学动态,2007(7):19-24.
- [5] 解保军. 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理论述评[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8(4):115-119.
- [6] 新华社. 习近平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2018-05-19]. http://www.gov.cn/xinwen/2018-05/19/content_5292116.htm.
- [7] WRIGHT E. The Meaning of Rousseau[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9] ANDRE G.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M].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1989.
- [10] 李咏梅. “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批判与生态正义——威廉·莱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哲学动态,2011(2):55-59.
- [11]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 [12] 顾海良.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 [13] 本·阿格尔.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 慎之,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 [14] 艾伦·杜宁. 多少算够——消费社会和地球的未来[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 [15] ANDRE G.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M].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4.
- [16] 王楠,张莉. 培养热爱自然珍爱生命的生态意识 把造林绿化事业一代接着一代干下去[J]. 紫光阁,2017(4):7.
- [17] 郑晓云. 用文化的力量助推生态文明建设[J]. 人民周刊,2018(21):66-67.
- [18]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 [2020-10-30]. <http://news.hexun.com/2020-10-29/202326040.html>.

(下转第47页)